

中西交通史

阎宗临 著

阎

宗

临

作

品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阎 宗 临 作 品

中西交通史

阎宗临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交通史/阎宗临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4

(阎宗临作品)

ISBN 978 - 7 - 5633 - 6510 - 4

I . 中… II . 阎… III . 国际关系史 - 中国、西方国家 - 16
世纪 ~ 18 世纪 IV .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336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101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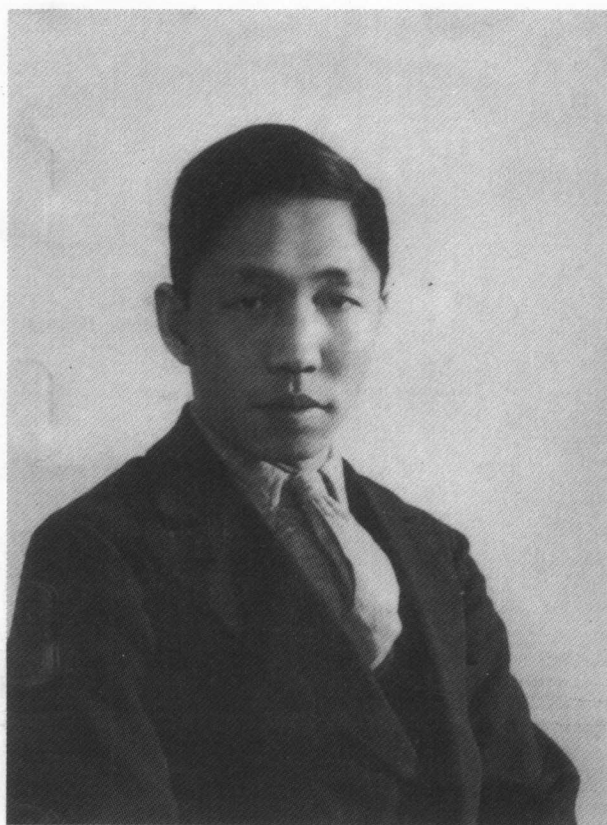
开本:960mm × 1 380mm 1/32

印张:12. 25 字数:300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閻宗臨先生(攝于1937年)

“佛國記”箋註

法顯曾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嚴、慧嵩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

《晉書》載記十七排轉上，有“改元弘始”的話，却沒有說相當於晉帝的那一

年。但是在姚興改元弘始後，提到襄陽流

入萬^入教晉而奔姚興。《晉書》帝紀十據此

事繫於安帝隆安二年十二月。這樣可以確

定姚興改元弘始當在隆安二年十二月前3

。己亥為隆安三年，改元弘始時為元年，

所以法顯稱其動身時為弘始二年。

《高僧傳》初集卷三說到法顯，“以晉

隆安三年（399年），發州長安，西歷流沙”。

按在乾歸同法顯異坐時間推算，即他離開

長安的期間，應該是至隆安三年三月間。

《法顯傳疏證》中，日人足立喜六說：“依

簡宗臨先生手迹

饶宗颐序

孙子有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此谋攻之要道，知胜之枢机也。治学之道，亦何以异是。西方之言学，其考论吾华文字史事者号曰汉学，以西方之人而热心究远东之事，盖彼欲有知于我，此学之涉于“知彼”者也。返视吾国人之有志于究心西事者，乃寥若晨星。庸或有之，留学彼邦，略涉藩篱，归国而后，弃同敝屣，多返而治汉学，稍为“知己”之谋，辄以兼通东西自诩，实则往往两无所知，其不每战不败者几希？近世学风，流弊之大，国之不振，非无故而然也。

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治学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推重。抗战军兴，余任教（无锡）国专，自桂林播迁蒙山，复徙北流，与先生尝共事，颇闻其绪论，心仪其人，以为如先生者，真有志于“知彼”之学者也。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殁谢，论者深惜之。哲嗣守诚世兄顷来书谓经已彙集先生遗书刊行在即，平生著述，自此可以行世，沾溉后人，为之大喜过望。不揣固陋，略序其尚，为陈“知彼”之学之重要，得先生书以启迪来学，使人知不能以“知己”为满足，而无视于“知彼”，则不免流于一胜一负。庶几欲求操胜算者，不至于南辕而北辙；则吾文之作或为不虚，亦可稍慰先生于地下也乎。

丙子春于香港

齐世荣序

阎宗临先生的文集即将出版，哲嗣守诚同志让我写篇序言，写序实不敢当，只能谈点拜读后的领会和感想，以表我对这位前辈学者的敬仰。

阎先生治学的范围很广，涉及中西交通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欧洲史、古籍笺注诸多方面，其中尤以中西交通史的成就最大。《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是阎先生在瑞士伏利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写的论文，以此于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该文史料翔实，多发前人未发之覆，是我国学者系统深入研究18世纪法国汉学大家杜赫德的第一篇论文（原文为法文），发表后随即引起了西方汉学家的重视。阎先生在巴黎、剑桥、梵蒂冈及布鲁塞尔等地图书馆辛勤查阅资料，收获甚丰，内中若干文件为我国学者向所不知。例如在《清初中西交通若干史实》一文中，阎先生根据他在罗马传信部档案中发现的资料，弄清了雍正三年（1725年）教皇本笃十三遣使来华的一些事实。阎先生还在《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一文的“附录三”中，抄录了康熙时传教士在华购置产业的契约20件，颇可注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阎先生写于1962年的《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是一篇体大思精之作，生前没有发表，估计作者对这篇文章十分重视，还要继续修改。总之，阎先生关于中西交通史，特别是明清时代基督教与中国关系的研究，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属于第一流水平。

阎先生于1937年回国后，在各大大学多次讲授希腊史、罗马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欧洲史等课程。在有关图书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他仍编写了《欧洲文化史论要》、《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罗马史》、《希腊罗马史

稿》、《欧洲史稿》、《世界古代史讲稿》等一系列书稿,其中除《欧洲文化史论要》和《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外,大多数没有正式发表。这些书稿所达到的水平,自然不如中西交通史方面,但由于阎先生对西方历史和文化的深刻理解,仍不乏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他认为:“构成中世纪文化的要素,概括地说,首先是希腊、罗马文化的遗惠,其次为新兴民族飞跃的活力,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基督教对物质与精神的支配。这三种动力的接触,并非水乳交融,他们互相冲击,互相排拒,受五六百年时间的锻炼始冶而为一,产生了一种新的意识与秩序。”(《欧洲文化史论要》,见《阎宗临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275页)他还认为:“文艺复兴却是由12世纪文化蜕变出来的。”(同上书,第294页)在《罗马史》讲稿中,他指出:“罗马的伟大,不在它的武力,而在它的法律。”“恃强凌弱,必然要淘汰的。”当然,阎先生在1949年以前还未接受唯物史观,所写的文章不免带有唯心主义文化史观的影响,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古文献的笺注,是阎先生致力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其中《身见录》是我国第一部欧洲游记,阎先生于1937年在罗马国立图书馆发现其原稿,拍照带回,笺注刊布,弥补了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北使记》与《西使记》,王国维在《古行记校录》中虽有校注,但较简略,阎先生的笺注较王氏为详,为研究中古中亚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阎先生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得力于他在国学西学两方面都有深厚的功底,称得起中西会通,这也是我国许多老一辈有成就的史学家共有的优点。阎先生留学瑞士8年,回国后一直教世界史方面的课程,不但精通法文、英文、拉丁文,而且他的国学修养也很深。例如,他在《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一文中,利用《册府元龟》摘录了太安元年(455年)至大历元年(771年)的波斯来华使节,还利用《本草纲目》,摘录了波斯产物及其输入之品物。《册府元龟》这部类书,因其仅采“正史”,不采杂书,曾为前人所轻,但实则有其高的史料价值。史学大师陈垣说,利用它,“可以校史,亦可以补史”。还说:“《册府元龟》书唐事,多据实录,按事按年排纂,与《新唐书》等之调弄笔墨者不同,其史料最为忠实。”(《书内学院新校慈

恩传后》，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4页）《本草纲目》是医药学宝典，但亦可用以证史。史学大师陈寅恪在《狐臭与胡臭》（《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0—141页）、《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等文中，均曾引用《本草纲目》。由此可见，阎先生虽主攻外国史，但引用中国文献时，也得心应手，甚为到位。今天的中青年应当向阎先生等老一辈史学家学习，打好基础，拓宽知识面，然后才能由博返约，达到一流水平，而不可一开始就在很窄的知识范围内阅读研究，更不可“速于成书，躁于求名”。

我们还应当学习阎先生对于著作精益求精的态度。他有不少论著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上述《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即其中一例），但生前一直未正式发表。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对自己的著作持十分严格的态度，他的标准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阎先生和许多前辈学者都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根据阎先生的学养和刻苦精神，他本来有可能达到更高的水平，留下更多的传世之作。但不幸的是，抗战时期回国，颠沛流离，以微薄的薪金养活一大家人，无法安心进行学术研究。解放后虽然生活安定，但又有一连串的思想批判运动，兼以地处山西，外文资料奇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世纪50年代末，阎先生曾对山西大学一位教师说：“连《圣经》都见不到，不能读，还学什么中世纪史！”拜读阎先生的文集以后，既对他的大著不胜钦佩，又对他的坎坷遭遇和未尽其才深感惋惜。今天，我国经济日益发展，政治环境宽松，社会和谐，中青年学者比前辈享有优越得多的条件，深望他们刻苦钻研，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绩。

阎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学者，浅学如我，岂敢为他的文集作序，无奈守诚同志盛意难违，只得遵命，好在读者自能品鉴，远胜于我的介绍。

2006年12月29日

编者语

我的父亲阎宗临逝世后,我曾编过《阎宗临史学文集》(1998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和《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2003年,大象出版社出版)。2004年,任茂棠、行龙、李书吉编的《阎宗临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除选编了对父亲论著的评论、他的学生的回忆及生平事迹等文章外,还收录了他的专著《欧洲文化史论要》。即使这样,父亲还有许多论著,没有能出版,如:1944年在逃难中写的《罗马史》,在中山大学时写的《希腊罗马史稿》、《欧洲史稿》,解放后写的《世界古代史讲稿》等。因此,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把他所有的论著(包括大量的手稿)编成三本书:即《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欧洲史》和《中西交通史》,这样,父亲的全部学术成果,就可以得到集中的保存,不致散失,相信这对今天的研究者,会有所启迪和助益,对祖国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是一点贡献。如今《阎宗临作品》三种的出版,使我多年来的愿望得以实现,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在父亲的三本书出版之际,我想谈谈这个愿望的由来。

我之所以有这个愿望,是因为我深知父亲求学的艰难。父亲于1904年6月18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中座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座村是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民风淳朴,土地贫瘠,当地农民都以土法掘煤为副业。父亲从小参加劳动,种过地,背过煤。他靠半工半读读完中学。1924年,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次年,在朋友们帮助下,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到巴黎,白天作零工,做过推土工、油漆工、锅炉工,晚间补习法文。两年后,迁居里昂,进入杜比兹人造丝工厂,先当勤杂工,不

久,被提升为实验室助理。在作工时,父亲节衣缩食,有了一些积蓄,1929年进入瑞士伏利堡大学学习。他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因此,读书非常刻苦,每到假期,同学们都到各地休假,他却留在宿舍继续苦读,因而各科成绩都特别优秀。

父亲在校主要学习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因此,就要学拉丁文。虽然由于拉丁文深奥难学,学校规定东方学生可以免修,但父亲还是选修了这门课。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在通过硕士学位前的拉丁文考试,他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拉丁文教授对这个东方学生的成绩感到十分惊讶,曾问他:“你从哪儿来的这股毅力?”他回答说:“我为了了解西方文化的灵魂。”1933年,父亲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学位。由于父亲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深得校长、教育学家岱梧教授器重,遂聘他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此同时,在该校研究院继续学习,1936年,取得了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父亲从一个农村的穷孩子,到完成国外的学业,全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其间经历的艰难困苦、坎坷曲折是难以备述的。

我之所以一直有这个愿望,还因为我深知父亲治学的艰难。父亲像所有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父亲正在瑞士伏利堡大学任教,他毅然辞去教职,谢绝了校长岱梧教授的一再挽留,和我母亲匆匆回国。在民族遭受危难的时候,祖国的命运远比个人的安危更使他关心。抗战期间,父亲先后在山西大学、广西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昭平中学及桂林师院任教授。抗战胜利之后,1946年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并于1948年至1950年任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父亲应张友渔、赵宗复的邀请,回故乡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学院)工作,直至1978年10月5日逝世,终年75岁。

回国后,父亲踏上了一条艰难的治学之路。父亲治学的艰难,一是客观环境的不良影响。解放前,正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战乱不已,时局不安,社会动荡,我们一家七口人靠父亲的工资维持,生活是清贫的。1944年,日寇侵入广西,全家辗转播迁于荔浦、蒙山、昭平一带,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解放后,生活虽然安定并日趋好转,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潮的冲击,直至“文革”都给学术研究的环境造成不良的影

响。这些是父亲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自不待多言。

二是研究资料的极其缺乏。父亲在欧洲期间曾购置大量图书资料,回国时运至上海,适逢上海战事,全部毁于战火,其中有鲁迅的书简、父亲翻译的《米开朗琪罗传》译稿及罗曼·罗兰为他写的序言等珍贵文献。在广西逃难时,又丢失了随身所带的书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对国外的学术动态及外文的历史资料原本就了解、掌握甚少,更何况父亲僻处山西,耳目分外闭塞,能见到的外文资料就更少了。尽管他精通拉丁文、法文、英文,日文和德文也都懂一点,有很好的语言知识,可惜几乎无一点用武之地。50年代末,他曾对一位中年教师说:“连《圣经》都见不到,不能读,还学什么中世纪史?”表达了他对资料贫乏、禁区重重的愤慨。这种状况,使父亲很难对世界史作深入的研究。我想,他内心一定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触,后来才转向从中国古代史籍中研究中外关系,这也是出于无奈吧。

三是学术思想的巨大转变。父亲的大学教育是在西方接受的,受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影响较深。他采用的文化史观和多元比较法,即从历史、地缘、人种、社会、文化、宗教诸因素上,综合分析,以阐明历史的发展演变,是西方史学中的重要流派。这在他写的《近代欧洲文化研究》和《欧洲文化史论要》两部专著和一些论文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解放后,他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思想,并以此重新认识历史。这对父亲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父亲是认真地、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并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进行学术研究。这就是他解放前后的论文有较大区别的原因所在。

此外,我还深知父亲的论著和手稿保存至今是很艰难的。父亲的论著除博士论文在瑞士出版外,其余大部分发表或写成于解放前,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广西桂林时。当时出版和发表的论著印刷粗劣,流传不广,逐渐鲜为人知。我整理的父亲的文稿,绝大部分都是他留下来的,只有很少是我从中国国家图书馆复印的。父亲的这些论著手稿得以保存至今,并不容易,至少经过两次大的劫难:一次是1944年在广西逃难时,衣物用具,丢失殆尽,全家七口人只有一条被子。但不论走到那里,父亲手里总

提着一只小箱子,里面装着几本重要的书、讲义和文稿。一次是在“文革”期间,父亲的文稿被“造反派”作为黑材料抄走,使父亲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我才懂得学术就是他的生命。后来,我几经周折,费尽口舌,才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将文稿取回。然而,父亲写的中篇小说《大雾》和散文集《夜烟》、《波动》等书籍,却从此丢失,再也找不回来了。

正因为我深知父亲经历的种种艰难,所以,我常想,父亲这些经磨历劫、呕心沥血取得的成果,在当今学术昌明的新时代如果再在我手里湮灭或散失,那就愧对父亲在天之灵了。这种责任感就是我的愿望的由来。

其实,我编父亲的文集,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缘分。解放后,父亲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从文化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回想起来,学术思想的巨大转变在父亲的心灵深处,一定留下了困惑。因为他对我们兄弟姐妹选择专业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他希望我们学理科,不希望我们学文科,尤其不希望我们学历史。当我表示想学历史时,他多次对我说:“学历史是个无底洞,太难,不如学理科,实际一点。”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都学了理科。只有我,在山西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两年之后,改“行”学历史,那是有种种具体原因促成的,父亲也无可奈何,只好认可。1962年9月,我转到历史系,正是阶级斗争理论大行其道之时,“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上山下乡、参加“四清”成了主业,我没有好好读书,父亲在专业上也没有指导过我,经常告诫我的一句话是“学好外语”。我也没有能做到。但毕竟兄弟姐妹中,只有我的专业是史学,整理父亲遗作的任务,就义不容辞地由我承担,我的兄弟姐妹和亲人也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这算是一种缘分吧!我想,这种缘分里,既有父子之间的亲情的责任,也有后学者对前辈学者的学术责任。那些在崎岖山路上攀登过、在荆棘丛林中开拓过的前辈学者,他们的学术贡献是不应该被埋没的。

我的愿望得以实现,父亲的论著能够出版,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责任编辑杨晓燕女士的热情帮助。我父亲从1938年至1943年曾在广西大学任专任教授,他的许多论著都写于此时。抗战八年,我们家都在广西度过,我也出生在桂林。这些算是与广西有点历史渊源吧。

父亲论著的出版还要感谢山西大学校长郭贵春教授、副校长行龙教授和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李书吉教授的大力支持和慷慨资助。我父亲的后半生都是服务于山西大学的。他逝世已近三十年,他的论著的出版,还得到现任校、系领导的重视,充分体现了这所百年老校对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相信山西大学会越办越好。

1998年《阎宗临史学文集》出版时,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欣然作序。饶先生是享有盛誉的国学大师。我把饶先生的序言依然放在卷首,以表达我对先生崇敬之意,并遥祝先生健康长寿。

齐世荣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也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元老。我到历史系后,齐先生对我一直都很关心,对我整理父亲的论著也很支持,勗勉有加。现又应我的请求,在百忙中撰写了序言。我愿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

我也愿借此机会向所有关心、支持、帮助过我整理出版父亲论著的人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阎守诚

2007年3月4日

目 录

饶宗颐序	3
齐世荣序	4
编者语	4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	1
近代中西交通之研究	16
中国与法国 18 世纪之文化关系	41
中国文化西渐之一页	58
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之使节	69
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	99
康熙使臣艾若瑟事迹补志	114
康熙与克莱芒第十一世	120
嘉乐来朝补志	124
康熙与德理格	127
白晋与傅圣泽之学《易》	132
关于白晋测绘《皇舆全览图》之资料	135
清初葡法西士之内讧	137
票的问题	142
雍正与本笃十三世	146
苏努补志	153
关于麦德乐使节的文献	157

碣石镇总兵奏折之一	164
澳门史料两种	168
乾隆十八年葡使来华纪实	172
解散中国耶稣会后之余波	178
《身见录》校注	187
《北使记》笺注	199
《西使记》笺注	206
《佛国记》笺注	222
《佛国记》笺注后记	274
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	276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

任何国家的文化都不是完美的,如果没有别的国家文化来补充!文化起于需要,适应各个民族的生存,正如丹纳(H. Taine)所论,受气候、种族与时间所限制。因之,在文化起源上,虽有播化论与创化论的争辩,但我们则同意发明与传播各半的主张。法国汉学家,有主张中国文化发源于埃及或巴比伦,他们的推论,有时颇近乎形而上学。我们知道中国以破布制纸,埃及用制纸草制纸,墨西哥又用别种原料制纸,难道中国与墨西哥同受埃及的影响吗?

概括地说,在秦汉以前,中国文化是独立的;在晋隋以后,佛教输入,形成李唐的文物及宋元明的理学。蒙古崛起,驰骋欧亚,虽开东西交通坦途,但在文化上无特殊成就,只留下马可·波罗富有刺激性的见闻记而已。土耳其兴起,阻塞中亚路线,为夺取东方香料,发现若望神长,以收拾十字军残局,发现新航路,这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史实。中西文化在印度洋也便正式接触了。

万历九年(1581年),利玛窦来华,西方文化随公教输入,所不幸者,西方谋利者,挟其优越武器,未给中国留下良好印象,而中国卫道心切,只认西方文化是术而不是学,西人只知利而不知义,于是中西文化起了剧烈的冲突。这种矛盾,鸦片战争时始被击破。自此而后,中国备尝各种苦痛

* 原载《建设研究》第6卷第2期,1941年。